

CHENGSHI

KONGJIAN

XINGWEI

GUIHUA

城市 | 空间 | 行为 | 规划 | 丛书

主编·柴彦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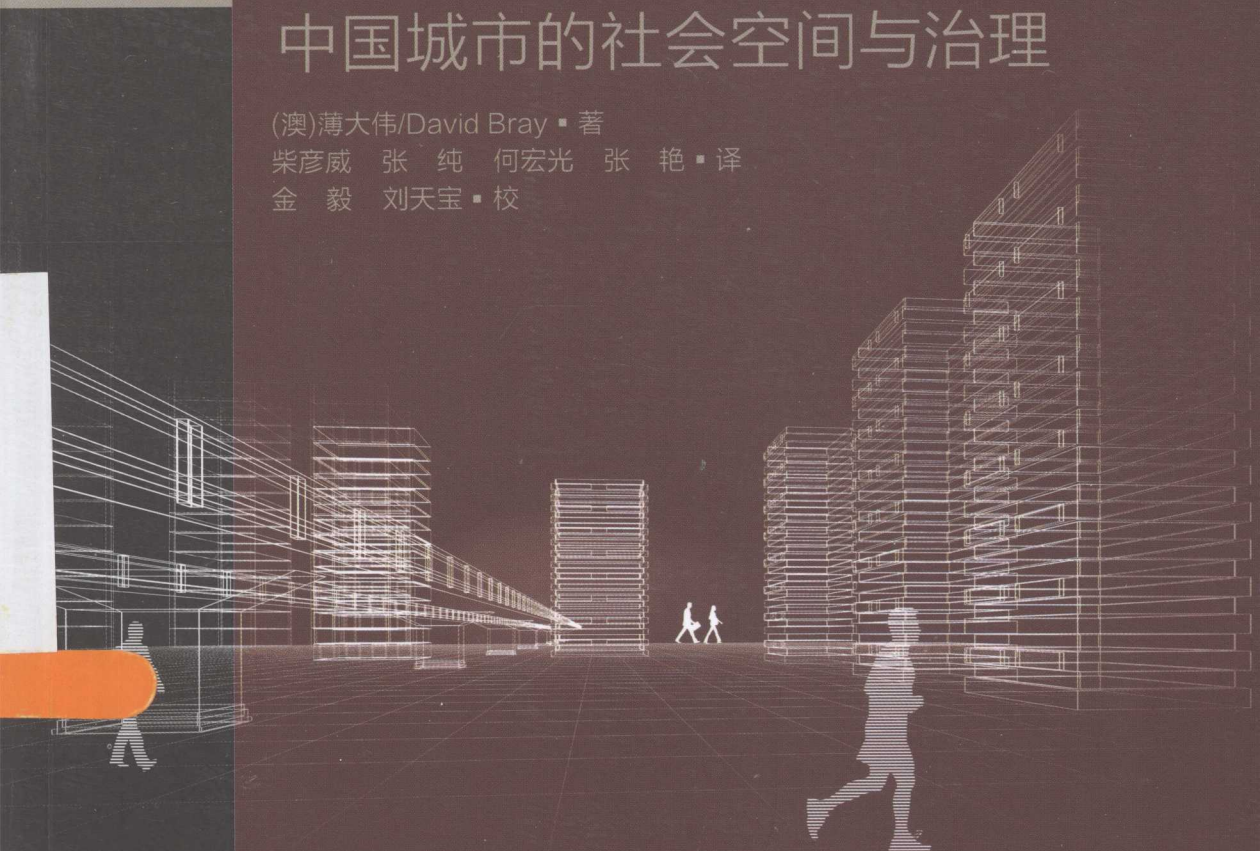
# 单位的前世今生

## 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

(澳)薄大伟/David Bray · 著

柴彦威 张 纯 何宏光 张 艳 · 译

金 毅 刘天宝 · 校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014039091

C912.81  
118

城市·空间·行为·规划丛书

柴彦威主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0711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1AZD085

# 单位的前世今生

## 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澳)薄大伟/David Bray 著

柴彦威 张纯 何宏光 张艳 译

金毅 刘天宝 校



C912.81

118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4



北航

C1726972

10083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  
(澳)薄大伟(Bray, D.)著;柴彦威等译.—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3

书名原文: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ISBN 978-7-5641-2801-2

I. ①单… II. ①薄… ②柴… III. ①城市学—研究  
—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1098 号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by David Bra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org.

中文简体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3-382

书 名: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

著 者:(澳)薄大伟/David Bray

译 者:柴彦威 张 纯 何宏光 张 艳

责任编辑:孙惠玉

编辑邮箱:894456253@qq.com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 编:210096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江建中

印 刷: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张:15.5 字数:289 千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2801-2

定 价:49.00 元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东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  
联系(由话或传真.025-83791830)

## 总序

进入 21 世纪,地理流动性越来越成为塑造人—地关系的核心要素,物流、能量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形成的流动性网络正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信息化、全球化、机动化逐渐成为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力时,“变化的星球与变化的城市”就越来越成为科学界的共识与焦点。地理学长期关注不断变化的地球表层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地理学日益成为当今科学和社会的核心内容,一个地理学家的时代正在到来。

经过 20 世纪的几个重要转向,人文化和社会化已然成为当今地理学科技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正在从人—地关系研究转向人—社会关系研究。解释人文地理现象的视角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等转向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个人因素等,研究的总趋势是从宏观描述性研究走向微观解释性研究以及模拟与评估研究。与此同时,地理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转向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人本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可见,在以人为本及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人与社会的实际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学科发展整体转向的大背景下,城市空间研究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基于时空间行为的个体研究正在成为理解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城市空间社会现象的关键所在。分析挖掘时空间行为本身的规律与特点及其对城市环境和决策制定的影响已成为当下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视角和热点问题。有关时空间行为决策与时空资源配置、日常活动空间、城市移动性、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环境暴露与健康、社会交往与社会网络、社会空间分异、移动信息行为等新的城市研究思路,正指向一个更加人本化、社会化、微观化以及时空整合的城市研究范式。可以说,基于个体时空间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范式蔚然初现,并向地理信息科学、城市交通规划、城市社会学、健康与福利地理学、女性主义等领域跨界延伸,在交叉融合中不断拓展学科的研究边界与张力,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充实城市空间与规划研究的学科基础与理论建构。

以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等为核心的时空间行为研究,注重现实

物质性的本体论认识,突出对“区域与城市中的人”的理解,强调制约与决策的互动影响,通过时空间框架下的人类空间行为研究,深化了“人、时间与空间”的认识,建构了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城市研究与规划应用的时空哲学和方法论。随着时空间行为数据采集、计算挖掘、三维可视化与时空模拟等理论与技术的不断革新,时空间行为研究在研究数据与方法、理论与应用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新的转向与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历了社会、经济、空间等的深刻变革。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中国城市空间正处在不断重构的过程。城市空间的拓展与重组、郊区的形成与重构、社会空间的显现与极化、行为空间的扩展与隔离、信息空间的形成与异化等成为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空间研究的热点。单位制度解体与快速城镇化等促进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移动性大大增强并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交通拥堵、长距离通勤、生活空间隔离、高碳排放、空气污染、公共设施分配不平衡等城市病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科学地把握居民各种空间行为的特征与趋势,引导居民进行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日常行为,建立重视居民个人生活质量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研究与规划实践的当务之急。

中国正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人的城镇化与城市社会的建设、加大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力度、遏制环境污染等已成为发展的重点所在。城市发展逐步从大尺度的宏观叙事转向小尺度的空间调整,从扩张性的增量规划转为政策性的存量规划,对城市规划的公共性、政策性与社会性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面对转变城镇建设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公正、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保护生态环境等目标,城市研究与规划工作者应在考虑土地利用、设施布局、交通规划等物质性要素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数据采集与挖掘,探索城市居民时空间行为规律与决策机制,提供实时性、定制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加强城市规划方案与居民行为响应的模拟评估。通过基于人的、动态的、精细化的时间政策与空间政策的调整,减缓居民时空间行为的制约,提高时空可达性,促进社会公正。通过城市时空间组织与规划、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规划、个人行为规划与家庭移动性规划等重新建构城市的日常生活,从而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表述。

2005年以来,由城市地理学、城市交通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为主的

学者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聚焦于人的行为的正面研究,企图建构基于行为的中国城市研究与规划范式。该研究会每年举行一次研讨会,聚集了一批同领域敢于创新的年轻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领先性的学术成果,成为行为论方法研讨的重要学术平台。

本丛书是时空间行为研究及其城市规划与管理应用的又一重要支撑平台,力求反映国内外时空间行为研究与规划应用的前沿成果,通过系列出版形成该领域的强有力支撑。在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新框架下,将城市、空间、行为与规划等完美衔接与统合,城市是研究领域,空间是核心视角,行为是分析方法,规划是应用出口。

本丛书将是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与规划的集大成,由时空间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城市行为空间研究和城市行为空间规划等三大核心部分组成,集中体现中国城市时空间研究与规划应用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水平,为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与行为规划提供科学支撑。其理论目标在于创建中国城市研究的行为学派,其实践目标在于创立中国城市的行为规划。

柴彦威

2013年秋于北京大学燕园

## 献给 Louise

（内容模糊不清，似乎是关于 Louise 的叙述）

（内容模糊不清）

# 目录

总序 / 1

献给 Louise / 1

## 1 导论 / 1

1.1 单位是什么? / 3

1.2 研究单位 / 5

1.3 关于单位的“谱系法” / 7

1.4 城市空间的理论化 / 9

## 2 高墙大院:单位空间实践的谱系 / 17

2.1 中国的墙与文化 / 18

2.2 探讨墙的谱系 / 21

2.3 围墙围合的城市:宇宙观、治理和社会秩序 / 22

2.4 由墙围合的家院:宇宙观、家庭,以及儒家道德标准 / 25

2.5 总结 / 32

## 3 现代性与 1949 年前的社会组织:单位雏形的出现 / 38

3.1 主体性和单位 / 39

3.2 重绘传统主体性:民国城市中的行会、帮派和企业 / 41

3.3 延安时期和单位雏形的出现 / 46

3.4 延安时期的主体性 / 48

3.5 延安和治理性 / 50

3.6 对中国社会主义治理性的分析 / 54

3.7 总结 / 60

## 4 从空间治理到治理的空间化:革命性空间实践的出现 / 67

4.1 追溯城市规划的谱系 / 69

4.2 治理术 / 70

4.3 城市规划的出现:奥斯曼对巴黎的规范化 / 73



## 2 单位的前世今生

- 4.4 革命性空间 / 76
- 4.5 社会主义空间 / 79
- 4.6 保达诺夫、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浓缩器” / 82
- 4.7 斯大林主义 / 86
- 4.8 总结 / 89

## 5 治理城市中国:劳动、福利和单位 / 95

- 5.1 包下来:社会保障的出现 / 97
- 5.2 组织起来:城市动员 / 99
- 5.3 组织工人:工会和单位 / 102
- 5.4 工会大争论:对单位的启示 / 105
- 5.5 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治理技术 / 109
- 5.6 干部和单位 / 114
- 5.7 总结 / 117

## 6 单位空间 / 126

- 6.1 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局限 / 129
- 6.2 空间形式的标准化 / 133
- 6.3 单位大院的出现 / 140
- 6.4 “单位”的空间模式 / 143
- 6.5 总结 / 152

## 7 单位改革 / 160

- 7.1 从“群众路线”到“盈亏线”:单位管理实践的改革 / 163
- 7.2 抵制劳动纪律 / 166
- 7.3 从大院到街道:城市空间实践的革新 / 168
- 7.4 单位、城市和市场 / 170
- 7.5 住房改革和单位 / 173
- 7.6 从单位大院到门禁社区:住房发展的新趋势 / 176
- 7.7 精简单位:国有部门职工大规模下岗 / 177
- 7.8 下岗与单位 / 178
- 7.9 从单位到社区 / 179
- 7.10 沈阳模式 / 182
- 7.11 总结 / 186

<b>8 结论</b>	/ 199
8.1 单位的理论化	/ 200
8.2 权力、主体性与单位	/ 201
8.3 治理性与单位	/ 202
8.4 空间与单位	/ 204

参考文献 / 207

图表索引 / 233

致谢 / 234

译后记 / 236

# 1

## 导论

整个历史有待由空间写就——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这两个术语都是复数形式),从地缘政治学的宏大战略,到居住性或公共性建筑的微小策略(如教室、医院的设计),从经济到政治的设施……空间中的停驻点是一种值得细致探究的政治经济形式。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7<sup>1</sup>

本书尝试书写中国城市中一种特殊空间的历史,这种特殊城市空间是社会主义工作单位,或者说“单位”的空间表现。这么做并非旨在简单描述物质空间形式及其随时间的演变,而在于探寻福柯所说的那种空间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将目光聚焦于单位这种社会主义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我尤其想探寻,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战略是如何通过它们创造和建构的特殊空间秩序形态,并影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本书的潜在假定是:对空间构成的细致研究,能够为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本质提供崭新的视角。我将证明,单位为进行这种分析提供了尤其丰富的土壤。

我在此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基于米歇尔·福柯在其作品中提出的一套方法。首先,为了追溯单位的历史,我采用了福柯提出的“谱系学”(Genealogical)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历史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试图去重建过去,或者对发展过程进行准确无误的叙述,而是旨在探寻现有的特定制度如何从通常是分散、不相关、不连续的实践的层层叠加过程中脱胎而出。<sup>2</sup>由于单位的出现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大范围的规训、治理、生命技术和空间等实践的并置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我认为谱系学方法提供了一种特别恰当的分析框架。其次,我采用了福柯的权力概念,这一概念认为,权力是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由知识、组织制度行为以及生命技术策略相互作用的复合体。单位富含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也就为应用和发展这种微观的实体权力提供了沃土。再次,我使用了福柯分析统治合理性的技术,用他的术语即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在这一讨论的主体中,福柯提出一系列关于治理本质的问题,从而对许多传统假设进行挑战:治理的对象是什么?什么类型的问题被认为是适合由政府干预的?怎样使干涉具有可行性?大众如何才能被动员起来,实现自我管理?凡此种种。那些支撑现代政府活动的合理性,以及政府实施其目标的实践活动,也因时因地而异。就中国而言,我将在本书中提出,单位曾经是一种独特社会主义治理术的核心。最初,单位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组织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成为社会主义管治形态得以在城市人口中进行部署的一种途径。尔后,单位本身出现了问题,影响了政府干涉的限制因素和可能性。通过对单位的详细研究,能够进一步阐明和完善有关中国治理的本质这一基本问题。

支撑本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跨学科的。我尝试基于涵盖较长历史时段的一手和二手文献建立起分析视角,这些文献涵括了许多学科领域,包

括建筑学、城市规划、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政治学等。由于我本人既非人类学家也非社会学家,所以我不曾尝试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或问卷调查,而是试图以很多关于中国城市的既有经验研究为基础,将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与既有知识、档案整合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中。在进一步详细说明我的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更充分地介绍一下我的研究对象。

## 1.1 单位是什么?

“国外学术界一般把单位译为 Unit,但是,Unit 这个词远远表达不了中国单位概念的丰富内涵。‘单位’现象是我国多年来在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形成的诸多独特性中最具有典型性和综合性的一个表现。”<sup>3</sup> 术语使用的问题往往在翻译时被放大,尤其是从以字符为基础的语言翻译成语音文字时。中文词语“单位”可以表示“测量单位”,也能表达完全不同而且更复杂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统治社会主义中国城市的特定社会组织形式。和前引朱光磊所言一样,我感觉 Unit 这个词远不能表达单位在这里的第二个义项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所以,相比起选用一个近似的英文名词,我更倾向于仅用罗马字母 *Danwei* (与其在现代标准汉语拼音系统中的罗马字母表达形式一致)来表达这个词。这起码能在某种程度上突出这一组织的独特性和它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基础。

也许,最好是由一个相当简单的定义开始:单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作场所及其包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总称。路风在其关于单位的开创性研究的导言里,着重强调了单位这一名词是如何标示了一个中国所有城市工作场所共享的“系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人们把自己所就业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研究所、文化团体、党政机关等等——统称为‘单位’。这种现象说明我国的各种社会组织都具有一种超出其各自社会分工性质之上的共同性质——‘单位性质’。”<sup>4</sup> 显然,单位可以有很多种,正如贺星寒所说:“大单位<sup>5</sup>,小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党政军,全民,集体。甚至寺庙也可以比附为地市级、县团级之类单位。”<sup>6</sup>

虽然单位有不同种类、不同规模,但他们的功能范围相当。正如李汉林所指出的那样,单位为其成员提供的不仅仅是薪水:“在中国,单位不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工作使之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通过分配住房,公费医

疗,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以及为职工子女就业需要的服务公司或集体企业等等,还为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服务。”<sup>7</sup>

然而,全面的物质利益(俗称“铁饭碗”)仅仅是单位功能的一个方面。正如贺星寒所说:“它也管思想改造、政治学习、治安保卫、结婚离婚、入团入党、奖惩处分。”<sup>8</sup>单位行使着政治、司法、民事和社会方面的诸多职能。因此,单位为城市居民提供了首要身份来源:

它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权利(力)、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比如到别的单位去联系工作,购买飞机票,住宿……都需要持单位的介绍信或通过单位进行办理。其他单位的成员则更多地根据单位介绍信中所确认的对方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来决定自己与对方行为互动的方式和态度。<sup>9</sup>

地位问题对于单位成员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面子这一重大问题。易中天这样阐述道:

工作是一个人的饭碗也是一个人的脸面。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有面子。没有工作不仅让一个人没有面子,更糟的是他可能被归类为“可疑人物”或者“危险人物”。人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工作的人会被认为是“失业闲散人员”。<sup>10</sup>

如果说单位在广阔的社会中为其单位成员提供了身份和脸面,那么它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社会身份、一个共同体和一种归属感:

“我们是同一个单位的。”这句话带着兄弟姐妹的温情,同时也可以意味着互相攻讦甚至潜在的敌意。因为中国人传统中的自我界限模糊,必须生活在人情之中,才感到自如。……所以,单位再差,毕竟是单位,比孤独地在社会上游荡,强多了。<sup>11</sup>

典型的单位设计更能强烈地激起共同体感和归属感,这种设计表现为一个个被圈围起的单位大院,并且成为了中国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美国记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关于一个中国受访者所在的单位大院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她住在她们部属大院里一栋五层灰砖建筑中的一套房里。所有的邻居都在这个部里上班。她进出都要经过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卫, 如果她带任何来访者进入大院都需要在出入登记本上登记。她九岁的儿子在大院里的另外一栋楼里上学, 她在院里小卖部购物, 如果有家人病了大院里也有诊所。<sup>12</sup>

总之, 说单位是中国城市的基础一点都不夸张。它是大部分城市居民就业和生活资料的来源; 它对人们进行组织、管理、管制、培养、教育和保护, 为他们提供身份和面子, 并且在截然分开的空间单元中形成整合的共同体, 城市居民于此产生了地方感和社会归属感。没有单位的人被认为是“可疑”或“危险”的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证明了单位的重要性。

那些熟悉中国现状的读者肯定会反对说, 我说的都是过去时而非现在意义上的单位。我承认上述某些特点现在已不常见或者不再具有普遍性, 很多城市居民没有单位也一样过得很舒适, 而且对很多人来说, 近些年来单位的重要性已经显著下降了。<sup>13</sup> 但是, 我要提出两点来维护我的观点。第一, 本书的主体是研究典型单位的起源, 即改革前社会主义单位的起源。<sup>14</sup>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上述描述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有用而相关的介绍。第二, 至少是现在, 我认为断言单位已经消亡尚不成熟。在第7章我将说明, 单位系统的某些方面至今仍有影响。本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单位过去的形式与实践现在不断被再利用并加以创新。因此, 我相信认为单位已经淡出中国是不明智的。

## 1.2 研究单位

过去十年间, 单位在中国研究中从默默无闻变得备受关注。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可以归因于一系列事件的联结: 其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沟通渠道的日益通畅, 使西方学者得以对中国的基层工作场所进行个案研究; 其二是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复兴。<sup>15</sup> 后者在中国的发展尤其关注改革时期, 即转变经济和制度操作模式的需求, 促使更多关注基层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学术研究应运而生, 而这些基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正是现在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系统的基础。<sup>16</sup>

日渐增多的关于单位的文献中, 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充满分歧。第一个争论的热点是关于单位的起源问题: 单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 抑或

其形成主要受社会主义时期以前的中国传统所影响？关于单位的性质学者们也各执己见，它或是被描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遗留，或是社会控制的工具、福利团体，或者是培养政治和管理精英的系统。最后，单位今后的命运和走向也是争论的焦点：一些评论家理所当然地预测单位将消亡于经济和结构改革中；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尽管单位实体被逐步削弱，但其影响仍然很大。

关于单位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魏昂德(Andrew Walder)可能是该领域中最著名且最常被引用的权威，他尤其反对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单位。<sup>17</sup>他在分析中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之下发展出的工业人员(Industrial Personnel)管理机制，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有着共通之处，而非主要受中国古代传统的影响。<sup>18</sup>除了劳福顿(Barry Naughton)挑战性地提出“单位制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sup>19</sup>以外，其他大部分学者在探寻单位制度起源时均以1949年为分水岭。路风、吕晓波和吴本立(Brantly Womack)将他们在“共产主义供给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其他实践中发现的现象视为单位的“革命性”起源。<sup>20</sup>其他的学者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叶文心(Wen-hsin Yeh)则从民国时期的劳动和管理实践中寻找单位的前身。<sup>21</sup>

在该领域最近新增的一项研究中，马克·弗雷泽(Mark Frazier)对1949年前后运作的几个中国工厂进行个案研究后总结道，单位制度“能被理解是为覆盖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期各个不同阶段的劳动管理制度的基模”。<sup>22</sup>从很多角度来讲，弗雷泽的成果可以算是对之前众多学术工作的综合。他没有限于从某个特定政策或特定时段中去寻找一个确切的根源所在，而是认为单位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实践叠加而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单位视为一个留有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同影响的印记的综合制度。尽管这一模型似乎为劳动管理、工资制度和福利分配等相关方面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仍旧不能回答单位制度的其他方面。例如，我们怎么解释典型单位大院的空间安排——封闭的高墙和主要建筑具有象征性的轴线布局？我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有关起源的问题。

一些学者提到了单位制度许多更早的起源。虽然路风将当代单位的组织基础追溯到延安时期，<sup>23</sup>但是他也认为单位制度与封建社会宗族体系存在深层的历史联系：“从形式上，单位和传统宗族制度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在成员身上施加了家长式的权威；强调个人对集体的责任多于



个人的权利,同时集体必须承担照顾其成员的全部责任。”<sup>24</sup>路风进行了比较,但却不能提供证据以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历史关联。事实上,他的这部分观点似乎建基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高度简化的二元对立之上。在这个模型之下,单位展示的“家长权威”和“集体性”所标记的事实,足以作为封建影响的充分证据。

文化历史学者杨东平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单位有着更早的历史关联。在他对北京和上海的比较研究中,杨东平指出,“墙”是证明现代单位和前现代中国的文化习俗之间存在联系的关键符号。<sup>25</sup>他特别指出,从古至今被沿用的高墙大院的空间模式提供了清晰的实体证据来支撑这种联系。然而,杨东平没有提供事实证据来支持他的观察,但他启发了我的进一步研究。我的研究将从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空间实践和空间构成开始,以更全面挖掘单位这一人造社会空间的谱系。

假定现代单位和前现代化的实践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单位本身是“封建残余”。相反,我认为单位必然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制度构成。问题在于,“现代”始终留有之前实践的痕迹和影响。单位受中国过去的空间实践影响,同时受到了更晚的民国时期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历史和苏联的影响。不存在一个确切的根源或者主要的影响来源,而是将不同实践层层叠加的复杂过程。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是不可能突出这种复杂性的——而谱系法则恰好适合这种问题。

### 1.3 关于单位的“谱系法”

福柯的“谱系法”很具启发性,因为它在“国家”本质或构建社会组织的相关问题上,没有就国家/社会的二分关系提出先验假定。相反,“谱系法”仔细考虑了世俗的日常实践的复杂性,意在挑战“真理总是深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观点。因此,这种方法不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性历史,而是一种“以史鉴今”。<sup>26</sup>

福柯的谱系学研究,其核心主要是四方面的内容。首先,他坚持认为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如果没有某个领域的相关知识构成,就不存在权力关系,也不存在任何不以权力关系为先决条件和不构成权力关系的知识。”<sup>27</sup>他运用“谱系法”研究了监狱系统,通过揭示了犯罪学等领域的知识和在现代监狱制度性实践中出现的规训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证明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sup>28</sup>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指出权力与知